

商学院
文库

新制度经济学

(第二版)

杨德才 编著

商学院
文库

新制度经济学

(第二版)

杨德才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制度经济学 / 杨德才编著. —2 版.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4

(商学院文库)

ISBN 978-7-305-16656-3

I. ①新… II. ①杨… III. ①新制度经济学
IV. ①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530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商学院文库
书 名 新制度经济学(第二版)
编 著 杨德才
责任编辑 府剑萍 编辑热线 025-83592193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3 字数 560 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2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656-3
定 价 50.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

第一节 什么是制度? 为什么要研究制度?	1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发展的现实背景	6
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发展的理论基础	11
第四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范式	17

第二章 交易费用理论

第一节 交易费用	22
第二节 基本假设	25
第三节 交易的区分标准	28
第四节 治理结构	32
第五节 纵向一体化	37

第三章 产权理论

第一节 “公地悲剧”与市场失灵	42
第二节 产权及其作用	45
第三节 科斯定理及其应用	50
第四节 产权理论的发展	57
第五节 产权制度与经济结果	65

第四章 企业理论

第一节 企业的性质	73
-----------------	----

第二节 委托代理关系	78
第三节 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86
第四节 不完全契约理论	91

第五章 国家宪政理论

第一节 国家起源与国家实质	97
第二节 诺思的国家模型	108
第三节 国家与宪政	110
第四节 国家与制度变迁	116
第五节 国家与经济增长	121

第六章 意识形态理论

第一节 缘起、内涵及特征	131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变化	137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140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	143
第五节 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	147

第七章 社会资本理论

第一节 社会资本的涵义	155
第二节 社会资本的类型的	159
第三节 社会资本的形成的	163
第四节 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	168
第五节 社会资本与经济绩效	175

第八章 法经济学理论

第一节 法律与经济学的接轨	180
第二节 法经济学一般理论	188
第三节 法律：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194
第四节 法律的供求及其均衡	199
第五节 一个案例：财产法的经济分析	203

第九章 制度变迁理论:供给需求视角

第一节 制度变迁:概念与原因	208
第二节 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	212
第三节 制度变迁的方式比较	218
第四节 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	226

第十章 制度变迁理论:博弈论视角

第一节 博弈论框架下的制度	233
第二节 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关系	242
第三节 主观博弈模型与制度变迁	248
第四节 制度的历时性关联与演进	253

第十一章 利益集团理论

第一节 利益集团与制度变迁	259
第二节 利益集团的规模与集体行动	265
第三节 利益集团的投票与制度变迁	268
第四节 利益集团的寻租与制度变迁	276
第五节 利益集团博弈下的制度均衡	283

第十二章 制度绩效理论

第一节 质疑传统经济增长理论	287
第二节 诺思的制度绩效理论	298
第三节 格雷夫的制度绩效理论	308
第四节 制度与绩效:一言难尽	312
第五节 制度决定绩效:衰落抑或进步	317

第十三章 路径依赖理论

第一节 路径依赖理论:缘起与方法	324
第二节 诺思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	328
第三节 路径依赖理论:格雷夫的贡献	335
第四节 路径依赖、制度锁定及其冲破	340

参考文献	346
后 记	353
第二版后记	355

学习目标

1. 掌握什么是制度,为什么要研究制度。
2. 了解制度经济学产生、发展的相关情况。
3. 了解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4. 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范式。

诚如罗纳德·科斯所说,自马歇尔以来的岁月里,在杂志、教科书上所见到和大学经济系的课堂里所听到的都是主流经济学的内容,但是它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抽象,尽管它自己不说,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正与现实世界越来越疏远。^① 亚当·斯密曾经指出,我们应当关注现实中的商品和劳务以及是什么决定它们的种类和数量。尽管这样,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的时候,却忽略了那些在市场中决定什么商品和劳务被交易因而被定了价的因素。这种对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具体事情的蔑视态度,却成了经济学家们的习惯,并且他们自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②

所以科斯认为经济学家们要把一件事作为主要的工作,那就是研究经济制度。因为他认为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系列经济制度当中,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福利依赖于整个社会所提供的商品与劳务,而这些又取决于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③ 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这是迄今为止制度经济学家们给出的最为重要的结论。从制度的重要性的结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试图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给出一种清晰的解读。当然,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还远没有成熟,许多理论与现实方面的问题至今仍困扰着很多的学者,但是,我们试图整理出一个框架以全面地介绍这一学科的最新进展,同时也使初学者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第一节 什么是制度?为什么要研究制度?

传统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影响,毋庸置疑,市场可以被认为是人类

①② [法]梅纳尔主编:《制度、契约与组织》,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③ [法]梅纳尔主编:《制度、契约与组织》,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创造的最令人瞩目的制度之一。但是最近十几年来,为了理解不同国家不同的经济绩效,“制度是重要的”这一观点已经变得日益重要。20世纪最后10年中发生的与制度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和现象已经并将继续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①

一、什么是制度

制度究竟是什么?诚如青木昌彦所说,我们不能把制度等同于法律条文、非正式规范、组织、合同等等,或者这些因素的部分或者全部的组合。给制度下一个定义取决于我们分析的目的。^②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如下的问题:既然制度对于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并采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中运用的最佳的制度呢?这是诺思提出的一个问题,诺思把制度定义为“博弈的规则”,同时将它分为两类:正式规则(宪法、法律和产权制度等)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于是他认为,即使能从国外学到良好的正式规则,但由于本土非正式规则的惰性一时难以改变,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使得新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也难以奏效。

那么制度怎样才是可实施的呢?实施者又怎样被激励去实施他理应实施的制度?而激励实施者去实施这一制度的制度又怎样是可实施的?为了避免这种无穷循环式的推理,一种办法是试图说明制度是内生的。制度是社会制度博弈的参与人之间策略互动而形成的自我实施的结果,借用一个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可以称之为“博弈的均衡”。

如果总结一下,可以这样认为:从短期来看,制度是对人们行为进行制约的人类自身设计的规则;但是从长期来看,制度又是人类社会内生的、社会博弈参与人之间策略互动从而最终自我实施的均衡结果。在现实中,对于制度定义的取舍取决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当我们研究短期现象的时候,制度作为一种外生的约束而社会参与人无力改变制度的时候,我们采用前者;但是如果我们研究社会制度的形成、演化以及变迁的时候,后者就成为合适的选择。

为了更加形象地理解制度涵义,下面将利用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提到的日本德川时代灌溉系统的例子来进行说明。一般而言,灌溉系统作为一种社区内的公共产品,由于技术上排他性的困难,试图阻止社区灌溉系统修建与维护过程中偷懒的社区参与人从中受益是成本高昂的。但是由于社区本身的封闭性,青木昌彦认识到,社区可以采取在其他领域(比如社区活动、邻里之间的互助以及社区的内在认同感方面)对偷懒的社区参与人进行惩罚。由于社区的封闭性,小农经营的风险需要社区内的合作,这种有效的惩罚措施使得这种制度可以变成自我实施的。即每一个社区参与人都会自觉地参与社区对于灌溉系统的修建与维护,从而使这一制度得到很好的执行。

如果我们来分析一个社区参与人的自身的决策,这时已经形成的稳定的制度所带来的惩罚措施对于社区参与人而言,是一种外在的决策的约束。社区参与人在进行是偷懒还是合作的决策时,会意识到偷懒可以节省一些参与灌溉系统修建与维护所带来的成本,但是由于制度会对偷懒行为进行惩罚,这种惩罚对于社区参与人而言也会形成一种损失。所以这样两种损失之间的权衡,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理性的社区参与人的选择方式。在这里,制度对

① 本节主要参考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1章和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章的内容。

②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页。

于社区参与人而言,是一种对其选择行为的外在的约束,因为单靠一个社区参与人本身无力改变这种制度,而一旦社区参与人发生不遵循制度要求的行为就会受到集体的惩罚,这时对于社区参与人来说,制度是外生的。

但是制度本身的形成与瓦解又是如何进行的?如青木昌彦所言,是由于在其他领域形成了可以进行惩罚以及足够的惩罚才使得理性的社区的所有参与人都会自然选择合作的策略,从而灌溉系统作为一种制度的维持成为一种均衡。然而,一旦外在条件以及其他情况发生变化,情况又会怎样呢?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①他们发现,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封闭社区内的灌溉系统瓦解了,由于存在技术进步的成本约束、外来的机会以及外部的服务替代,使得得以维持灌溉系统的惩罚措施变得无效了,这导致了对于社区内部参与人而言,偷懒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当偷懒成为社区参与人共同信念的时候,这一制度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制度对于个体参与人的约束,由于理性的社区参与人共同信念的变化而变得没有效力,从而制度发生了变迁。这种制度就是内生的,是社区内部参与人之间策略互动使得原先的自我实施的共同信念不能维持,新的共同信念的出现导致了制度的变化。所以,在研究制度演化、制度变迁的时候,将制度视为一种社区内部参与人之间策略互动的博弈均衡是比较合适的。

【案例 1-1】

制度约束之谜

为什么人们甘心自己受限于制度?监督和制裁可能足够严厉,以至于个人发现遵守制度符合自身的利益。然而,由于制裁的实施对于那些执行者来说通常具有很高的成本,所以,这个答案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执行者实施制裁的激励是什么?实际上,依靠制度中依次上升的等级来实施制裁可能会导致一种毫无秩序的状态,因为没有制度来约束最高的等级。此外,即使个人面临的被发现和制裁的风险是如此之小,以至于遵守制度似乎不符合他们当前的自我利益,但个人常常还是会遵守制度,而且那些有能力改变制度的人可能并不会对规则进行修改,虽然这会给他们带来直接利益。

制度约束之谜或许可以通过考虑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规则作决定的立法机关来最好地加以说明。如果立法机关在两个或更多的政策方向上进行抉择,那么,在所有偏好模型中,除了一些无足轻重的情况外,任何偏好都可以被另外某种偏好所战胜。可预见的结果是,即使立法者有稳定的偏好,立法机关也不能产生稳定的政策选择。稳定性可以通过在立法机关内部构建权威以对议程设定施加限制的规则来获得。一种获得稳定性的直接方法是将议程的绝对控制权授予单个成员。稳定性还可以通过一种不那么独裁的方法获得,即通过规则,将就特定政策领域提出修改建议的权力授予独立的委员会。但是,如果立法机关通过多数投票原则将这种规则加于自身,那么,当委员会阻碍了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建议时,它能够终止或修改这条规则。只有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结构的约束,结构才可能产生均衡的政策选择。

一种“一般均衡”的制度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支持和执行规则符合个人的自身利益,这种规则是局部均衡分析的对象。这样,这种理论在以下意义上具有一般性:它不依赖于外部执行。它是一种理性选择理论的制度,因为它假定所有的行动者都追求自身利益。

① 时磊:“由灌溉系统的崩溃到西部乡村社区的瓦解——一个博弈论的分析框架”,《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将社会中的相互作用构造为重复博弈模型,为一般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我们首先将社会中的相互作用构造为一个阶段博弈模型,它在以下意义上体现了合作或协调问题:参与人对某种可能结果的偏好胜过均衡结果。接着,我们考虑一个由一系列阶段博弈构成的成功博弈。根据阶段博弈中的支付和参与人的贴现率,我们常常能够找到参与人的均衡策略,它能够产生参与人所偏好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在阶段博弈中却非均衡结果。

许多学者采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惯例和规范。Andrew Schotter 则将其更一般地推广到制度上。他将制度定义为不断重复的社会环境中的规则。因此,规则在参与人中是共同知识,每个参与人都预期其他参与人将遵守规则,并且,如果其他人都遵守规则,对任意参与人来说遵守规则将符合其自身利益。换句话说,制度可以被解释为重复博弈的均衡。

Paul Milgrom, Douglass North 和 Barry Weingast 对中世纪的“法律商人”(Law Merchant)制度进行的研究显示了这种理论是如何与实证研究相联系的。他们考察了一个重复合作博弈,其中随机选择的一对交易者决定是否签订并遵守合同。他们证明,向私人法官或法律商人登记合同能够成为有关订立和遵守合同的均衡的一部分,这些法官或法律商人对违约进行判决并保持较好的裁判声誉。这样,涉及法律商人的贸易就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自我维持的制度。

资料来源:[美]戴维·L·韦默主编:《制度设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二、为什么要研究制度

为什么要研究制度?这个问题在前面实际上已经涉及。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其根本原因就是制度决定经济绩效。为了加深对“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这个判断的理解,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解释的必要。

传统经济学对于增长本身的研究不可否认带有很多的偏见。就生产的增长而言,增长理论从生产函数出发,认为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但是技术进步在很多时候是偶然的、外生的,这种情况甚至到最近的新增长理论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自身的积累主要取决于历史的初始值及其以后演进路径上的一些参数,但首先历史初始值又是从何而来,演进路径的参数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些参数本身的稳定性又取决于哪些因素?这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主流经济学对于增长的研究越来越多地陷入了这种“牛顿经济学”的藩篱,机械的决定论的哲学基础弥漫于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研究中。

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冲破了这些研究的偏见,试图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与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这种对于经济增长历史动因的解释从生产技术上转移到人类社会本身,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思的结论不仅改变了传统增长理论的研究结论,而且开辟了一种更加宽阔与现实的研究思路。这种研究思路是基于历史和更多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与传统经济学增长理论注目于成熟稳定的市场制度下经济增长的研究不同,这种增长研究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也给经济学带来了更多的声誉。因为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以及提出的很多富有现实意义的增进社会福利的结论,大大地震撼了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现代经济学的传播在最近20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不可否

认,新制度经济学在其中居功至伟。

那么制度是怎样影响经济增长的?阿夫纳·格雷夫的观点很有启发性。格雷夫认为,好的制度通过鼓励储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以及有用知识的开发、吸收等方式来促进生产。这些制度还可以维持一个可持续的人口增长率和有利于社会福利增进的和平环境,它也有利于创造出可以联合动员社会资源和提供公共品供给的良好政策。^①这种说法承接于传统的经济学范式,从生产函数以及影响生产函数的外部环境出发,很好地阐述了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与间接的贡献。而诺思和托马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可以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接近的活动,^②这样就能够激励人们去从事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诸如技术创新、积累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等。

按照西蒙·库兹涅茨所理解的现代经济增长,其主要是指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而收入增长首先可能是由于投入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等)的增长,这种直接的增长导致全面的外延的增长,它表现为人均实际要素数量得到了迅速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可能表现为一种或者几种生产要素效率的增长,这种生产率的增长可以表现为规模经济的实现、生产要素质量的改进、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的减少,或者组织变革使得市场的不完善得以消除等。

如果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就是投资和创新,那么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增长呢?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苏联、东欧以及改革以前的中国。这些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里,保持了相当高的投资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教育投资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像苏联的尖端的技术创新也是非常迅速的,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却是非常低的。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同等投资水平的国家。而且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改革以后中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迅速的技术进步,投资水平不但没有很大上升而且还有些下降,但经济却保持了令人吃惊的增长速度。所以,忽略制度的增长研究,根本无法解释在这些国家发生的事情。而对于制度详细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于增进社会福利的增长过程有着更加清醒的理解。

诺思和托马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之所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它可以使得从事社会增长所需要的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这样个人必然有激励去从事这些活动。所谓私人收益就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人的利得或者亏损,而社会收益指社会从个人经济活动中获得的福利改善或者损失。二者之间可能出现的不一致是由于存在第三方可以不经私人同意获得某些收益或者承担私人所强加的成本(经济学中称之为外部效应),这就会导致社会需要的活动的数量与私人供给的活动的数量之间的不一致,从而降低了社会经济的增长。

既然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国家并没有动力借鉴其他国家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或者即使借鉴了也没有实施成功呢?其原因正如前文所讲的,正式制度的学习与实施要与非正式制度保持一定的一致性,而非正式制度的演化与改进却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当然还存在着其他的原因,因为制度是社会所有参与人之间策略互动从而产生

^① Avner Grief: *Institution and the Path to Modern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1.

^② [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5页。

的自我实施的均衡结果,所以,社会参与人的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的构成以及历史的起点都决定着制度本身的选择。可见,制度的学习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过程,这也就是萨克斯、杨小凯等所声称的后发劣势存在的原因。^①

所以,研究制度成为人类一个重要的课题。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目前提供的有益的结论是:制度决定经济绩效,所以制度是重要的。但是制度怎样决定经济绩效?如果一个社会处于无效率的经济制度之中,社会应当怎样通过自身的内部选择摆脱这种无效率的状态,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人类社会福利的增进?如果制度是可以模仿的,那么应当如何模仿?如果制度是不可模仿的,为什么不可模仿以及如果不可模仿怎样选择出有利的经济制度?有效的经济制度有没有统一的模式?在制度呈现多样化的现实世界里,制度是否都朝着有效的方向演化与进化?太多的问题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这些问题本身也制约着人类福利的增进,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制度经济学研究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关于这方面的成果也正在大大改善我们对于制度和经济增长关系以及制度本身的起源、产生演化与进化的理解。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我们知识的扩展使我们面临更加广阔的未知世界,所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发展的现实背景

如前文所言,传统主流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影响。一般均衡理论不仅是对市场机制完善性的概括,而且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与中心。如果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看作是对这种理论的“天才猜想”,那么,帕累托和瓦尔拉斯则是这种理论的系统化论述者。不过这种理论的证明也像“哥德巴赫猜想”难住了数学家一样而成为经济学家的难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阿罗、德布鲁完成了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数学证明,整个经济学似乎如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已经终结。阿罗-德布鲁范式的建立使得自瓦尔拉斯以来系统化、规范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的经济学主题一下子消失了,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开始考虑这种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诚如一位哈佛学者所说的那样,经济学是一门不断自省从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就在阿罗、德布鲁用精妙无比的数学方程搭建出一般均衡的一般构架之后,有人津津乐道于经济学的使命已经终结,有人夸夸其谈于经济学家们今后要做的就是让一般均衡模型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更加细化而已。然而,经济学界并非铁板一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一般均衡理论乃至整个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完全理性、社会制度无摩擦运行以及信息的充分性等的前提假设表达了担忧,^②而哈罗德·德姆塞茨、赫伯特·西蒙、罗纳德·科斯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这个时候,一向被忽视的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的罗纳德·科斯的的思想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科斯认为,20世纪初形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背离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传统,摒弃了人的主体性觉醒和对人本身发展的分析,专门着力于经济生活层面的数量分析,因此称之为

^① 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卷第4期,第961~988页。

^② 刘俏:“冷门的风光”,《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10月14日。

“黑板经济学”。他认为这种经济学只注重抽象的演算,忽视现实的经济现象,就如同闭门造车。^①因而,科斯主张经济学应当关注现实世界,应当增强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力,而不是拘泥于抽象的理论演绎。而科斯本人的研究正是遵循这一思路。科斯认为,现实世界的制度运行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是无摩擦的,现实世界存在着高昂的制度运行费用,这种费用被称为交易成本。诺思认为,作为最直接的形式,交易成本是解释经济绩效的关键。

一、发展中国家与制度经济学

真正导致制度经济学开始变得重要的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研究的转向以及对于转型国家转型过程、方式与绩效的深入思考。随着 20 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地摆脱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如何发展这些落后国家的经济以增进这些国家人民的福利成为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原因以及以后的研究主题。这一时期十分盛行的西方增长理论研究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哈罗德、多马以及罗伯特·索洛关于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的理论结论在发展经济学中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但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足够的居民储蓄能力,所以就不能形成足够的资本积累,为此还形成了两种理论:一种就是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另一种是“国家主导型的赶超战略”理论。

“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是关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的一种理论,由纳克斯在 1953 年《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理论》一书中提出。他认为,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资本的稀缺。这是因为宏观经济存在着两个恶性循环:供给方面,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由此导致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导致低生产率,低生产率进一步导致低收入,低收入又意味着低储蓄能力。需求方面,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由此引起投资引诱不足,进而导致低生产率,低生产率导致低收入,低收入又导致低购买力。这两个恶性循环互相影响,使得经济状况无法好转,经济增长难以实现。这一理论最为核心的观点就是资本缺乏是造成两个恶性循环的关键,因而资本形成在消除经济停滞、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②

“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对于二战以后取得独立的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要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要么积极争取外援改善资本形成,要么加大政府的干预以加速资本形成。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借入外来资本以发展本国经济,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从墨西哥开始,大量的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经济发展因之而受到很大冲击。这里固然有从发达国家借入资本时附加的各种苛刻条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发展中国家自身不利的制度条件可能更为主要。

另一种影响很大的发展战略模式就是林毅夫等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总结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导型赶超战略”。^③由于要迅速积累大量的资本投入到工业

① 周业安:“行为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吗?”<http://www.seruc.com/wenzhang/xwjx.htm>。
刘辉:“现代经济哲学:迈向新世纪的经济学和哲学联盟”,<http://www.ccec.edu.cn/xxjs/glx/jpk/management/chengguo/doc/ff/07.htm>。

② Nurkse, R.: *The Problem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③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章。

化赶超所需要的重工业部门,这在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运用市场机制是行不通的,所以运用国家的强制手段,扭曲资源配置的价格、剥夺微观主体的自主权、改变宏观经济环境,使得资本积累得以迅速进行,成为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选择。当然苏联经验的相对成功对于发展中国家也起到很好的鼓舞作用。不可否认,这种战略理论的背后也存在着当时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子。这种理论对于资本积累极端强调,认为重工业的发展是实施赶超的关键所在。而且这种战略不仅为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相信 19 世纪以来自由贸易竞争的市场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适用的,^①认为需要广泛而持续的政府干预来减轻贫困和改善收入再分配。也就是说,通过普遍的价格管制以及通过对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的管制来改善国家的再分配,用国家的稀缺资源来满足穷人的需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与进步。

通过国家干预以获得公平与更快增长的经济理论很大程度上与卡尔·马克思以及约翰·凯恩斯对于自由放任市场体系弊端的批判不谋而合。但正如拉尔所说,令人悲哀的是,许多国家干预主义的信奉者无疑将他们那套信仰作为一种替代物,与基于自由市场的信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思潮的兴起扭转了古典经济学时代的国家发展模式,大量的发展中国家采取政府的绝对干预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苏联模式。但诚如林毅夫等在评论中国这一战略所带来的问题时所说的那样,从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的经济增长绩效来看,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以及相应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造成了产业结构扭曲和激励机制不足两大问题,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的改善。虽然这几十年的发展养活了占世界人口数量 22% 的中国人民,也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代价却是高昂的,并且赶超的目标没有实现。^②

当时,除了中国、苏联和东欧一些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之外,还有一些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也选择了赶超型的发展战略。这些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都很不成功,都没有实现赶超的愿望。例如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和玻利维亚,它们的人均收入在 19 世纪末和德国相差无几,但是经历一个世纪之后,目前仍处在经济上困难重重、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十分缓慢的不发达状态之中。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被认为是仅次于日本的“明日之星”的菲律宾现在也是处于经济停滞和混乱之中。^③

发展中国家以吸收资本和加速资本形成为目标的发展战略的失败,导致了世界性的对于经济发展战略和理论的反思。林毅夫指出是发展战略本身选择的失误,因为这些发展战略违反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更多的反思在于很多经济学家认识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不是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本,而是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以及如何正确的使用资本这一问题,也就是制度的问题。所以很多发展经济学家渐渐认识到,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依赖于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良好的经济制度可以节省资本的使用、替代资本,使已有的资本得到更加充分地利用。

① [英]迪帕克·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章。

②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③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9页。

正如彼得·鲍尔所批评的那样，“与其说发展依赖于资本积累，不如说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本”。“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始于不发达。假如恶性循环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人类将仍处于石器时代”。^① 所以鲍尔认为，当一个发展中国家摆脱了初始的贫穷状态之后，决定其经济发展效果的主要因素在于本国的制度和政府行为。

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战略本身的反思使得以研究制度为特征的新制度经济学更多地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诺思“有效率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的结论在迷失于增长陷阱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者们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取向在制度体系十分不健全、发展举步维艰的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因为在制度体系已经十分成熟的发达国家，对于制度研究的福利意义已经十分狭小，很多的制度经济学者回归到中世纪、工业革命以前、18世纪、19世纪，从经济史中寻找自己的研究素材与研究结论，这也成就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史学革命”。但是这种研究对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运行并没有十分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当这种研究方法与研究取向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和深陷于转型的不确定与风险之中的“转型国家”时，对于怎样发展、怎样转型、怎样改变无效率的制度以增进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利产生了十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

二、经济转型与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引来巨大的声誉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转型国家转型过程中提供的较为有效的分析方法与结论。虽然许多转型国家(如中国)也是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但是转型国家复杂的转型困难以及甚至比发展中国家更加痛苦的转型历程，使得我们认为十分有必要单独谈谈新制度经济学在其中发挥的卓越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集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特点于一身的国家，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意义可能更加意味深长。

正如热若尔·罗兰所言，“给转型国家提供政策意见的结果，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最好的结果也只能说是威信扫地”^②，传统经济学的政策建议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失败。所以约翰·格雷甚至评述道，俄罗斯是20世纪最不幸的国家，因为它两度成为西方世界乌托邦的试验场。第一次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它制造了非工业化和饥馑，导致了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农业集体化摧毁了俄罗斯农民的农业生产。第二次是休克疗法，它的目的是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建设自由市场体制，但它产生的却是由黑手党控制的无政府资本主义。^③ 所以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仅仅导致了20世纪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变化与变革，而且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这一场转型中由于提供的拙劣的建议而导致了威信扫地也不得不面对较大的变革。对于“德布鲁范式”建立以来宣称经济学已经终结的经济学家而言，现有经济理论对于真实世界的苍白无疑是一个太残酷的现实。由于来自基础教科书经济学提供的建议所带来的种种变故，导致了经济学研究重点的进一步转移，并且大大强化了制度学派的观点，强调了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由各种制度支撑的重要性的观点。^④

① 转引自：[美]詹姆斯·A·道等：《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31页。

② [比]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③ [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6~167页。

④ [比]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从制度体系的相互支撑、相互依赖与契合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简单的制度移植难以取得经济制度变革绩效的改进。诚如诺思所言,当相同的规则集合施加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其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会很不一样。虽然规则相同,但是实施机制、实施方式、行为规范以及行为者的主观模式都不一样,于是真正的激励结构和被认知的政策结果就不同。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实施机制、实施方式、行为规范以及行为者的主观模式等都属于广义的非正式制度的范畴,所以要对制度真正的激励结构和被认知的政策结果从而对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变迁进行评估,就必须要对非正式制度进行一番深入的分析。诺思曾提出自己对于转型的解释。他认为,正式制度的引进必须要和原有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相结合,否则企图一蹴而就,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悲惨的。

新古典经济学从马歇尔以后,只是强调自由市场体系本身的运作,强调在自由市场体系内怎么实现市场的均衡以及均衡的稳定性与福利效应,而帕累托的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理更是将自亚当·斯密以来自由市场的神话予以定理化,所以,在对转型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时,所有的西方经济学者无一例外地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但是怎样实现由计划体制向自由市场的良好转型呢?这个话题却是新古典经济学从未遇到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自由市场本身的运作,没有自由市场而创造自由市场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只要自由市场得以创造出来,它就可以根据现有的经济理论进行很好的运转。然而,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根本不知如何创造自由市场体系,因而,他们希望就像上帝创世纪一样能够从西方世界转移一个模本以满足那些转型国家的需要。

正是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后来指导转型国家转型的那些像创世纪一样的“大爆炸”计划、“500天计划”等,便一个一个出台了。但是,像热若尔·罗兰所说的那样,通过把资本主义制度引入前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繁荣与富强,对于大多数转型国家而言绝不是一件胜券在握的事情。因此,热若尔·罗兰认为,设计能够使资本主义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成功的经济转型政策,就成为一项重大的任务。^①

显而易见,对于以研究自由市场体系内部资源配置与自由市场运作的新古典经济学而言,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任务。理论与现实的需要要求经济学必须做出变革,以对涉及全球超过四分之一人口的转型国家人民的福利予以关注。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正值此风云际会之时,新制度经济学以研究社会制度的运转、变迁与演化为主题,既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自马歇尔以来的先进研究方法,又突破了其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对于涉及到非市场机制以外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与法律体系的起源、产生与演变做出了令人兴奋的解释。对于转型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它首先可以用来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体制进行深入地分析;其次又可以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进行深入地分析,揭示其内在的相互支撑的体系;然后还可以对如何从非资本主义体制实现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转变提供制度建议。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强调模式的单一性,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甚至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系也进行了分类,他们认为主要有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欧洲的福利资本主义和亚洲的关系型资本主义(亦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模式呢?布莱恩·阿瑟、罗伯特·戴维以及诺思发展出的“路径依赖”理论,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并认为制度的演化、

^① [比]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